

我們需要

忠實的反對者

——評「我愛凱撒」

有一份極端右傾，帶有法西斯主義色彩，而又標榜「愛國、反共」的政論雜誌，在不久前出刊的某期中，登載了一幅政治漫畫——漫畫中的主角是一位大鼻尖嘴身着黑衣面色陰險的賣藝人，手中操縱着一具小丑型的木偶，下面的按語指名道姓的說明黑衣人就是無黨籍的立委康寧

李震洲

祥，小丑則是自立晚報的特約撰述江春男（筆名司馬文武）。這一個人身攻擊的背景是因為康委員長任發行人的「八十年代雜誌」（現已被新聞局停刊一年），由司馬文武任總編輯，接續八十年代的「亞洲人雜誌」（現亦遭臺北市政府新聞處停刊一年處分），則由康委員長任社長，司馬文武任發行人，這種密切的配合搭檔，引起了上述那份政論雜誌的幻想和推論，於是做出了不道德的中傷。

姑且不論這種惡意的指涉，是否構成刑法三百一十條「意圖散布於衆而指謫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爲誹謗罪」之罪責，但是用這種「捨我其誰非我不可」的態度來進行反共大業，却着實令人心寒。「反共」不是少數黨派，少數個人，或少數團體的專利事業，它應該是集萬衆心爲一心，納天下力爲一力的集體事業，只要不違背大原則，意見上有若干不同，勿寧說那是好的，健康的；先總統蔣公所說「不是敵人就是同志」，是一個鑑別敵我的最低綱領，持着這種心態去反共，才能由敵人內部去瓦解敵人。反共獨佔論者只准許反共有一種型態，從其它的立場或其它的角度去打擊魔鬼，就會受到他們的詛咒和栽贓。

，康寧祥先生之所以被視爲「黑拳幫的餘黨」，胡秋原先生之所以被斥責爲「爲虎做倀」，「窩藏匪類」，也就是因爲右派憤怒發酵、膨脹、變質以後的結果。

黨外陣營中，「水準參差良莠不齊」是大家無法否認的；不分青紅皂白，一竿子全打成「一小撮陰謀份子，野心家」，是不是有是非不明別具用心？我們未能在敵後、在海外，積極的爭取敵人，拉攏中間份子，已經够失策了，難道我們還要在這一小塊土地上劃分彼此，去製造敵人，增加敵人嗎？任意指控別人和「臺獨」、「共產主義」的思想掛鉤，並不能證明自己愛國，因爲這種漫天飛舞的紅帽子，往往會傷害到真正的愛國志士，打擊到他們的士氣節操，這樣子的反作用和社會導誤的結果，使得左、右二極化尖銳對立，社會緊張程度增高，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愚昧誤國行爲。

司馬文武先生是小丑、傀儡嗎？這位東海大學政治系畢業，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出身的草地郎，歷任立法院編纂，中國時報專欄記者，海外版主編，自立晚報採訪組副主任，以筆名司馬文武在自立晚報所發

表的政治專欄，更是膾炙人口，能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他既不甘於做別人的鷹犬，也很少有人可以任意駕御他或是牽着他的鼻子走的。六十九年三月間他所出版的自選集「我愛凱撒」，充份的可以替他人的人格作證，證明他的愛國、反共沒有利己的動機，完全是站在一個知識份子的立場表達出他愛鄉土、愛社會、愛同胞的胸襟氣魄，這種膽識足以讓他那些以「忠貞」標榜的對手相形見拙。國民黨籍的司馬文武，立場上稱得上是「黨裏的自由主義者」，「黨內新生代的開明之士」，因為他無所求於黨，所以他勇於批評敢向權威挑戰，因為他不向學府、官府謀出路，所以他能不受權勢的束縛，這和別有居心的愛國者相較，誰具有道德勇氣？誰代表了社會良心？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這部選集的自序中，司馬文武一針見血的抨擊這類犬儒主義的知識份子，說「他們看到有權者犯了大錯，只能私下發發悶牢騷，但碰到無權勢者一有小錯，就立刻落井下井，盡量發揮言論自由和批評勇氣」，「他們藉批評來參與政治，但當他們批評別人是偏激的左派時，本身却自覺或不自覺地變成不問是非

的偏激中間派」；且讓我們閉目回想一下這一類型知識份子的善於羣犬吠日，他們的習於結黨結派，他們的工於探測風向，以及他們的「朕即真理」的思考方式，這種人的數目愈多，就國家長遠的利益着想，危險性就愈大，因為往往民族的一線生機，一股強烈的改革意願，就在他們的因循苟且，維護現狀的前提下，遭到了斷喪。

一位悲劇性政治人物雷震去世了，除了在報上看到中央社統一發布的一則不滿百字的新聞稿而外，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一位雷震的朋友、學生、門人、故舊，發表過任何一篇哀悼性的追思文字，來紀念這位在中國求自由、爭民主的過程中，孤獨的走在前頭的開路英雄。僅有的二篇紀念文字，一載自立晚報，一載長橋雜誌，都是由現年三十六歲，臺灣省籍，和雷震不曾有過接觸的司馬文武透過文獻的記載、資料的排比而執筆寫成的。這個工作由他來做，說實在的並不太十分合適，但是在鄉愿充斥，人人但求自保避嫌的社會裏，又有誰肯冒這樣的大不韙，來對一個因「包庇匪諜」和「為匪宣傳」罪判刑十年的人蓋棺論定？只有無所求於當道，而又無所懼於當權者的司馬文武敢

替雷震寫下這樣子的墓誌銘——「一個走在時代前面的先知，通常都逃不掉殉道的命運」，「他當時一些不合時宜的話，歷史却證明是正確的」，「他的悲劇是中國追求現代化政治的悲劇，他是中國民主政治的祭禮」。由雷震、殷海光等老一輩知識份子一生的轉變看來，有誰會相信輔佐湯恩伯將軍在上海保衛戰中鞠躬盡瘁，有劍客美譽的雷震，和三十八年被中共列為文化戰犯之一的殷海光，後來會被視為「反調份子」？他們為什麼會走上這條路的？是他們生得太早？或是我們政治發展速度太慢不能與之配合？這一連串的問題，值得我們沉思再三。

言論自由不是天賦人權，雖然憲法第十一條對這種自由權明文保障，但大半的時候仍要靠人們去爭取維護它。翻開我們的出版歷史，多少可歌可泣的光榮傳統。「自由中國半月刊」、「民主潮」、「文星」雜誌的鼓動時潮蔚為風氣，「公論報」、「徵信新聞報」、「自立晚報」、「民族晚報」的直言無隱形成清議，在在都顯示出了二十年前的新聞界很能反映民意；相形之下，今天的大眾傳播工具，一牽涉到比較敏感的問題就吞吞吐吐欲語還羞，上焉者語氣含混曖

昧點到即止，下焉者滿口諛詞極盡巧言令色之能事，司馬文武批評道：「其一進二退，有如鄭國小駟上陣，張脉奮興，陰血周作，進退不得，周旋不能」，「但是對於茶杯裏的風波却能評論得淋漓盡致」，這是當前輿論界普遍缺乏道德勇氣的寫照。司馬文武提出了一個質疑，那就是我們今天的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是否以犧牲一部份新聞自由做為代價？反過來說，在爭取言論、著作、講學、出版自由的尺度上如果更上一層的話，是否我們就無法再享受安定繁榮的建設成果？政治不是賭博，我們也不可能拿全國人民的安危禍福來試試看？但是我們由伊朗、韓國的混亂動盪觀之，自由尺度有如緊箍咒般的緊縮，未必能帶來安定祥和，就算一時求得表面上的和諧，這也只能說是暴風雨前夕片刻的寧靜。在一個開放的民主社會裏，「管制」、「設限」往往不容易收到既定的效果，反倒因為諸多的擾民苛民，引發了民心的積怨，面對着不可阻擋的民主憲政潮流，我們不能再開時代的倒車了。

韓國前總統朴正熙的遇刺身亡，此間的輿論界基於二國唇齒相依的友誼，利害關係，報導十分詳細，哀悼之聲不絕於耳，大體上說來這些個立論肯定讚揚

朴大總領成就者多，深入探討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給予一個公正客觀的評價者少，司馬文武寫的「我愛凱撒」，是一篇不同流俗有獨到見解的分析文字。毫無疑問的，朴正熙是一個愛國者，一個強人，也是韓國復興的最大功臣，他在肅清貪污，整頓社會風氣，全力拓展韓國經濟發展上，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與地位，但是他有他的弱點，他的後腳跟就是「不自由」、「不民主」、「個人獨裁」，國內的反對黨集中火力對他猛攻在這裏，國際上關切人權運動者對他懷疑和杯葛也在這裏。

爲了連任總統，他不惜修改憲法，然後一口氣連任了五屆，到後來他索性變更體制，使總統可以無限期的連任下去，爲了製造「法統」對他支持的假象，他制定了「維新憲法」，使三分之一的國會議員經由總統指定，這種反潮流的作爲，動搖了韓國民主憲政基礎；使得在傳統上往往能左右政局的三大力量——學生和工人，投入反對黨的旗下，學生、工人的罷工罷課遊行，在釜山和馬山，與鎮壓暴亂的軍警發生流血衝突，引起了反政府力量的空前大團結。惟一堅決效忠朴正熙的軍隊及特務力量，也因爲對處理國內政

潮態度不同而發生歧見分裂，中情部部長金載圭的遞出毒手，是整個悲劇事件的啓幕。在經濟上韓國是個強者，是個不可忽視的貿易競爭對手，它的外匯存底急劇增加，經濟成長率每年決不低於百分之十，但是在政治上却很少有人承認韓國是個民主國家，朴正熙治下的韓國數度頒佈緊急處分令，實行宵禁，查封報館，禁止集會結社自由更是家常便飯，尤其令人不解的，以種種「非常時期」、「特殊情況」爲理由，主張凍結憲法所保障之自由條款的，都是執政的民主共和黨所倡議的，主張護憲，尊重憲法精神的，反而是反對黨的人士，真可說是禮失而求諸野了。

朴正熙面對着反對黨日益膨脹的政治力量，不肯承認在現實政治中它們所應該具有的地位，仍然以高壓方式來對付他們，反對黨領袖被綁架回國入獄的有之，被開除議員資格的有之，被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的亦有之；反對黨的政治不滿情緒無法正當發洩疏導，只有訴諸於街頭的羣衆運動，以罷工、罷市、罷課來展現他們的力量，來向政府施加壓力。政府方面外有北韓的武力入侵可能，內有反對黨的頻頻牽制，內外交征的結果，往往會以防共爲藉口，以攘外必先安內

爲口實進行政治上的株連整肅，這種相互的不信任，和相互的蓄意打擊對方彼此激盪的結果，政局呈現不穩。

徐復觀教授在評論朴正熙事件時，從負面的價值做了一個結論，他說：「落後地區的政治人物，有二大特色，一個特色是幻覺自己有超人的能力，第二個特色是幻覺他們的國家若不由他掌權，頭上的天便會塌下來，於是運用一切藉口，一切方法，把可能取代他的現勢力、潛勢力，乃至於僅對若干黑暗面作合理的批評者，均要給以污染，給以打擊，給以消滅，使一個國家，必須倚賴他一人、一家、一黨，大小極權者，都是此種心理所弄成，朴正熙正是其中的一個」，拿這一段智慧之言來印證中共的毛澤東、華國鋒、北韓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菲律賓的馬可仕、南斯拉夫的狄托、利比亞的格達費等，無一不具有類似的氣息及幻覺。朴正熙的強人政治，優點是有魄力有擔當，爲了強化外銷出口競爭能力不惜使韓幣再三貶值，並成立大貿易商制度，爲了扭轉社會上不良浮華風氣，用行政命令來制定罰則，增抽奢侈稅；缺點則是人治氣息太濃，一切的典章、制度、法令都是爲朴

大統領而設的，一旦這棵大樹倒了，所有的政策都能會及身而亡，嚴格的說他並未替韓國的憲政建立一套垂諸久遠的規範章法，所以朴正熙本人當權時期這個體制能順利運作，換了其它人上台能否同樣有效，則大有問題。我們兄弟之邦的韓國，現正徘徊於「朴式的強人政權」、「軍人干政」或是「還政於民的民主憲政制度」的三叉路口上，究竟該何去何從呢？且讓我們拭目以觀。

英國的反對黨以「女王陛下的忠實反對者」自居，胡適博士當年也曾期盼過知識份子能共組一個「僅監督批評，不以奪取政權爲目的的在野黨」，這種自我期許及自我要求是今天無黨籍的政治人物所首該具備的條件。良莠不齊龍蛇混雜既然早爲人所詬病，爲什麼黨外人士不能發起自清運動？以切斷任何與「臺獨份子」、「叛國者」之間所可能會引起他人誤解的連繫。不要爲了反對而反對，時時刻刻把國家的福祉、民族的生機、社會的公平和選民的重託置於情緒好惡、黨同伐異、派系恩怨之上，在心態上要有做「防腐劑」的毅力，防止現政權的腐化遠比取得政權來得重要，因爲現階段的黨外陣營中缺乏足够的政治、經

濟、外交、軍事及行政管理的人才，以他們所擁有的潛力，能够扮演好各級民意代表的角色，充份發揮代議士的固有職能，就足以讓爲政者不敢掉以輕心。

只要國民黨不腐化，政府就有希望；只要政府有希望，國家就一定有前途。美麗島事件過了以後，黨外陣營損兵折將的結果，使得政治秀異份子人數銳減，再加上黨外的言論根據地也紛遭停刊處分，在這種政治氣候下，想期待黨外政治力量對政府有所監督批

評，短時間之內恐怕不易奏效，康寧祥、黃順興的在立法院審議選舉罷免法時的孤掌難鳴，卽爲一例。於是乎知識份子的參與政治展現才能，就成了填補政治真空的另外一股力量，司馬文武的書生論政，是知識份子言論參與報國的現身說法，他能够超脫於黨派成見、地域觀念之外，以學術知識爲後盾，抱着滿腔的熱情信心去褒貶時政，這種忠實的反對者，正是今天我們社會裏所最缺少的。